

文化研究 方法论

Cultural Methodologies

[英] 吉姆·麦奎根(Jim McGuigan) 编

李朝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1-18775-3



9 787301 187753 >

定价：32.00元

文化研究 方法论

Cultural Methodologies

〔英〕吉姆·麦奎根(Jim McGuigan) 编

李朝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9 - 57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方法论/(英)麦奎根(McGuigan, J.)编;李朝阳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5

(文艺思潮与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18775 - 3

I. ①文… II. ①麦… ②李… III. ①文化研究 - 研究方法
IV. ①G0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3628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Jim McGuigan, 1997

书 名: 文化研究方法论

著作责任者: [英]吉姆·麦奎根 编 李朝阳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8775 - 3/G · 310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印刷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23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致 莱 思 莉

致 谢

我必须感谢本书的作者们坚忍不拔的毅力,因为此项研究所花费的时间比最初预期的更长,引申出来的内容也更多。我也要感谢塞奇出版公司优秀的编辑克里斯和罗伯特·罗杰克,感谢他们良好的幽默感、想象力和出色的工作效率。最后,我也再次感谢莱思莉的耐心,感谢克里斯托弗和珍妮对我以及受我影响的其他作者在此书中艰涩文风的合理质疑。

利明顿

1997年7月

作者简介

托尼·贝内特 (Tony Bennett)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体政策中心主任。他的著作包括:《文学之外》(*Outside Literature*, 1990)、《博物馆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useum*, 1995)以及即将出版的《文化:改革者的科学》(*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安·格雷 (Ann Gray)

英国伯明翰大学高级讲师(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欧洲文化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编辑。她的著作包括:《影像娱乐时刻:休闲技术的诞生》(*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1992)、与吉姆·麦奎根合著的《研究文化》(*Studying Culture*, 1993, 1997)以及与海伦·贝尔(Helen Baehr)合著的《提上记事日程:女性和媒体读本》(*Turning it On: A Reader in Women & Media*, 1996)。目前,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的著作。

迈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

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系主任。他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员,并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加拿大蒙特利尔、法国蒙彼利埃以及德国慕尼黑等地讲学,其著述涉及文化政策、教育和媒体等领域。

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与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合著的《摄影机政治经济学》(*Camera Politica*, 1988)、《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1989),《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89)、与史蒂夫·贝斯特(Steve Best)合著的《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 1991)、《电视与民主危机》(*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1990)、《波斯湾电视战争》(*The Persian Gulf TV War*, 1992)、《媒体文化》(*Media Culture*, 1995)以及最近与史蒂夫·贝斯特合著的《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 1997)。

马丁·李(Martyn Lee)

英国考文垂大学高级讲师(研究领域为传播学、文化和媒体)。他的著作是《消费者文化的重生:消费的文化政治学》(*Consumer Culture Rebor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1993),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与现代主义有关的书,并参与编写即将出版的《消费者社会读本》(*The Consumer Society Reader*)。

吉姆·麦奎根(Jim McGuigan)

英国考文垂大学讲师(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他的著作包括:《文化平民主义》(*Cultural Populism*, 1992)、《研究文化》(*Studying Culture*, 1993, 1997)、《文化与公共领域》(*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1996)以及即将出版的《科技新城镇》(*Technocities*)。目前,他正在编辑一本关于文化政策的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并撰写一本关于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著作。

格拉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

英国拉夫堡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挪威卑尔根大学大众传播系教授。他的著作广泛地涉及文化传播的社会和经济组织领域,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他最新的著作是与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合著的一本分为上下册的书——《媒体的政治经济》(*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1997)。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消费的著作。

萨拜娜·夏基(Sabina Sharkey)

就职于华威大学英国比较文化研究毕业生中心,是文化研究和爱尔兰研究领域的硕士课程总监。她从事编辑的文集和期刊有:《女性:文化

评论》(*Women: A Cultural Review*)、《短评》(*Paragraph*)、《批判理论杂志》(*A Journal of Critical Theory*)以及《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目前,她即将完成一本关于17世纪爱尔兰的政治身份的专著。

卡罗琳·斯蒂德曼 (Carolyn Steedman)

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历史中心教授。她的著作包括:《好女人的风景》(*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1986)、《激进士兵的故事》(*The Radical Soldier's Tale*, 1988)、教育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Margaret McMillan) 的自传《生在英国:童年、文化和阶层》(*Childhood, Culture and Class in Britain*, 1990) 以及1995年出版的《1780—1930年间的奇怪错位:童年和人类的内心世界》(*Strange Dislocation: Childhood and the Idea of Human Interiority, 1780—1930*)。目前,她正致力于研究仆人、服务以及奴役在社会的现代身份构成中的角色及作用。

尼克·史蒂文森 (Nick Stevenson)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讲师。他的著作包括:《理解媒介文化》(*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 1995)、《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雷蒙德·威廉斯与E.P. 汤普森》(*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Raymond Williams and E. P. Thompson*, 1995)。最近,他编辑了一本关于文化和公民身份的论文集,并完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媒体的变形》(*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另外,他正在和凯特·布鲁克斯 (Kate Brooks) 以及彼得·杰克逊 (Peter Jackson) 致力于关于消费、身份和男人的生活方式的杂志的研究。

海伦·托马斯 (Helen Thomas)

英国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的社会学系系主任。她以舞蹈为关注内容出版了很多著作,包括:《舞蹈、性别与文化》(*Dance, Gender and Culture*, 1993)、《舞蹈、现代性与文化》(*Dance, Modernity and Culture*, 1995)、《城市中的舞蹈》(*Dance in the City*, 1997) 以及正在撰写的《身体、舞蹈与文化理论》(*The Body, Dance and Cultural Theory*)。另外,她还从事了关于在剧场和电子媒介中的文化工作情况的调查研究。

前 言

吉姆·麦奎根

此书的出版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即文化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以及科研基金申请方面所处的相当模糊不清的地位。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生通常必须将其研究工作纳入别的学科范畴之中,如艺术史、文学批评或者社会学。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研基金团体过去一直不愿意承认文化研究,而且也因为文化研究自身的界定也一直倾向于抵制其学术合法性,视自身为智力游击运动的一部分,并在官方的学术疆界上开战。这种浪漫而又具有英雄主义的文化研究观念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过时。尽管阻力重重,文化研究还是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完胜,在科研领域也是如此。文化研究的规范化以及大卫·钱尼(David Chaney, 1994)所称的人类科学甚至可能包括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转向”,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目前依然很难确切地说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取得了什么成就。很少有人试图阐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佩尔蒂·阿拉斯特里(Perti Alasuutari)的《研究文化》(*Researching Culture*, 1995)一书在这种普遍的忽视氛围中算是一个奇特的例外。

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是折中的,它广泛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做法,而且,文化研究本身也绝不是具有独立权威性的智力劳动,它一直具有多元化的特性,因此在谈及文化研究的任何宽泛问题时,其言说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一本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的书很明显必然是涉及多种方法论的。而且,另一个逐渐变得明显的问题就是:这项工作不可能做得十分全面。我试图列出所有被本书忽略的内容,而这也毫无疑问将被书评者和读者所列举出来。然而,正如本书的作者之一萨拜娜·夏基(Sabina Sharkey)所说:“把那些内容列举出来的做法看上

去不可避免地具有反击性和自卫性。”鉴于此,我不会首先列举出所忽略的内容以作出回应,而这些忽略则是我与此书的作者很可能遭到批评的罪过。

我们只能面对这一现实,人不能让其他所有人总是感到满意。对此,我深信不疑。一个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可能就是让大多数的人在一段时间内满意即可,而这些时间段也是各不相同的。本书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具有连贯性但却不够全面,而且,某些内容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作者们很可能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方法不应该与理论脱节,这也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关于方法论的教科书所延续的惯例。方法与程序有关,方法论则是研究工作的概念性基础,同时,方法的选择也要适用于方法论的目标。但是,正如大多数出色的研究人员所知,当一个人独自开展科研工作的时候,其研究方法可以由自己决定。方法应当为研究的目标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本书没有给出关于方法程序的大量建议,而是对各种方法论所持的观点进行了说明,因为这些与理论和实际情况中的研究有关。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方法论、研究和观点**。第一部分勾勒出文化研究领域内关于批判和实践的一系列方法论观点,其中也包括了对于伦理规范和与文化研究有关的女权主义的思考。第二部分将文献理论具象化于实际研究,提供了说明性的例证,而不是一份研究发现的目录清单。最后一部分回顾了文化研究在何种领域作为一种智力劳动得以形成,并在何种制度条件下得以运行。总之,本书致力于给新的文化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广阔的理解视角,让他们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不仅对专业研究人员有用,而且对从事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科研活动的学生也有裨益。

本书以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具有重建意义的论文作为开始,此论文关注文化研究中多重视角的批判任务。他认为,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Tuner 1996)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表达的脱节”,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德国并在20世纪40年代(见Bronner and Kellner 1989, Jay 1973)因理论家流亡到美国而得以延续。法兰克福学派首先划定了从跨学科视角出发进行传播批判研究的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多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

mer)和马尔库塞(Marcuse)的著作。然而,由于其“精英式”的大众文化批判和“被动式”的消费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在文化研究的主流领域,尤其在英国,通常遭到漠视或讥讽。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英国文化研究只关注“主动的受众”和“支配的受众”(McGuigan 1997),所以在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平民主义,这也导致英国文化研究受到了质疑。

凯尔纳并不只是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做简单的对照。这两派确有不同,但在脱离标准的学术划分和拒绝止步于文本的界限方面,二者有着重要的相似性。这是文化研究的发展中第三个重要的传统所在,也说明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有着重大缺陷。通过把文化分析和文化与传媒产业的政治经济因素的重新对接,可以实现一种补充。“全球后现代”不能只是被视为意义、身份和差异;跨国贸易和政治事务这些物质力量也必须被纳入研究范畴。凯尔纳的模式非常直接清晰,它包括:首先,对于文化的产品和政治经济因素的研究;其次,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再次,受众的接受研究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研究。由于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涉及这三个方面,因此,这三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在重要性上没有高下之分。凯尔纳在此章中通过电视类型和“明星”(对此观点更充分的论证和案例研究见 Kellner 1995)的探讨,说明了多重视角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虽然与道格拉斯·凯尔纳的研究出发点不同,但是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也远离了至今被视为文化研究主流的立场。然而,在他看来,更多地体现其观点特色的不是平民主义色彩,而是对立论。出于对这类文化研究不现实的政治意图的反驳,贝内特支持一种实用主义,认为文化知识分子最好被视为治国术的技师,而不是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的附属以及有机的、英雄主义式智力群体。虽然贝内特(1992)所提出的“将政策融入文化研究”的澳大利亚议程一直有争议(见 McGuigan 1996),但它的确关注了文化研究领域内教育和研究制度的实际状况。

文化研究已经拥有自己的课程和教科书的规范,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它还有“职业的培训”。必须承认的是,学生需要就业,而一项研究

如果或多或少与政策不相关的话,那么就几乎得不到资助或设备的支持。这就是现实的情况,而且在澳大利亚毫不奇怪。利奥塔(Lyotard 1984)认为知识具有表演性,这毫无疑问具有普遍意义。贝内特在本书中强调一种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更适度、更实际的政治环境,而不是过去那种典型的状态,同时,也保留了文化研究自身大部分的特色:跨学科性,包容性,对与阶层、性别、种族相关的多重权力的关注,以及对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特定位的现实认知。

在文化研究中,对其实用性的忽略是愚蠢的,而对伦理和道德关注的忽略则是不负责任的。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包含对伦理的反思是很正常的,不仅如此,它最好首先就提出伦理和道德问题,以便这些问题能够贯穿于研究工作各个方面的全部进程。这些问题不仅直接与娴熟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是对研究课题的尊重,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也与研究对象的阐释方法有关,因为在阐释研究对象时,首先要研究意义生成的实践和传播,尤其是通过现代媒介的传播。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在本书中通过具体的参考文献,关注了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文献包括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90)、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82)、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80)以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1993)等人的著作。

史蒂文森首先提醒读者注意他对媒介的独特认识(Stevenson 1995),这与概念化研究传媒的三种方法均有不同。首先,批判理论关注与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媒介角色;其次,接受那些关注、分析受众的解读和符号抵制的案例;再次,关注并分析传媒在现代性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种传媒的特性(Thompson 1995)。不论采取何种具体的形式,在大量的现代传媒研究背后,总存在带有目的性和民主沟通色彩的伦理关注。有人或许会辩称,此种关注是对新旧传媒运行方式进行批判分析的核心,而史蒂文森则断言:这正是他对此进行学术探究的动机。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主要观点,对于涉及文化和传媒的政治辩论而言很重要。他的对话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和对于体制和生活世界的区分,虽过于抽象,但彼此相关。然而,困难在于,哈贝马斯的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话和价值的普遍标准。任何一种普遍主义都被纳入对差异进行压制的质疑中,而女权主义理论对此争辩尤甚(见 Meehan 1995)。正如史蒂文森所指出的,吉利根的“关怀伦理”(ethic of care)一直在挑战普遍主义理性的性别盲区,以及过度的男权理性主义。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也存在消除沟通与文化的政治功能的危险。鉴于此,史蒂文森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中借鉴了很多内容,对哈贝马斯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和补充。最后,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ism ethics)也呼吁以一种温和、适度的方式取代对个人主义伦理的大量强调,毕竟当今世界似乎已经不再相信关于解放的宏大叙事。通过对这些与哈贝马斯相反观点的探讨,史蒂文森指出,与哈贝马斯的论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恰恰表明了对话伦理学的有效性。人们总是试图达成共识并了解必然性,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运行法则,使我们大多数的实践活动获得成就。这种现象在学术界也不时地出现,尽管在这一领域,更常见的可能不是共识,而是彼此误解。

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非常具有建设性,当然,也存在问题。安·格雷注意到,二者早期的紧张关系,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她强调二者的姻缘关系。必须承认,女权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不是一种学科出现的,因此它需要从“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中被区分出来。女权主义多种多样的表达给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带来了影响,因为它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相关。由于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都是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有着相似的争议性,而且在大学课程里都是相对新的课程,因此更理所当然地被拿来和女性研究一起对照。在格雷看来,尽管女权主义没有把自身定位为一种学科,但是它很明显地处在女性研究的核心领域,而且与文化研究的核心也十分接近。

都关注边缘的、沉默的和被压迫者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在官方学术界得以结成战线同盟的根本原因,也是它们持续这一姻缘的纽带。双方都旨在成为下层群体生活经验的代言人。早期的文化研究致力于言说劳动阶层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引人注目的年轻人的“亚文化”(subcultures)。最近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关注“种族”问题,

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性的问题(如 Gilroy 1993a, 1993b; Mercer 1994)。性,这个不仅仅包括性别附属和抵制的问题,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格雷认为,在“经验”这一问题上,女权主义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以澄清其认识论上的地位,而非普遍意义上文化研究的特点。这与正在进行的一场论争有关,该论争关涉到女权主义者在研究诸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 1987)这样作者的作品中的政治和方法论的统一。在“经验”的不稳定性,以及研究者在研究、代表女性的经验时所充当的角色方面,很多人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在这一领域,受女权主义者以及黑人研究人员之托,文化研究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

除了探讨这些涉及自身研究的宽泛问题之外,格雷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方法建议。她试图迂回地研究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中“人种学”的人类学批评(Nightingale 1993)。“人种学”这个术语一直被用来指称那些尚未完全满足人类学家的严格要求标准的研究内容,比如,漫长的实地调查研究、专业人类学家传统的检验标准和准入门槛(见默多克在本书中对此问题的探讨)。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原因的确在于实践和物质条件上的限制。格雷强调一种更为折中的途径,提供了可供选择并且现实可行的民族志学的研究方法。她强调访谈作为一种共性思维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从而对“数据”来源进行偶尔评价,同时,她也探讨了自传和生平故事可以作为有价值、具有辩护作用的研究方法这一问题。

文化研究中一种叫作“奖学金男孩”(the Scholarship Boy)的原型神话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是目前的作家对此仍有一些情感上的依恋,这种神话是说:出身工薪阶层的小伙子,通过受惠于福利国家的福利和教育机会,获得了“文化”。正如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所指出的,“‘奖学金男孩’作为一个有机的范式,并非就是‘奖学金女孩’的兄弟。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在1957年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这个名词。”霍格特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 1957)、雷蒙德·威廉斯的生平和学术生涯(Inglis 1995),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经历,都说明他们虽然处在不同的阶层,但却有着具备可比性的种族的个人成长轨迹,而那些都是这一神话的特色。通过调查,

斯蒂德曼在本书的一章中认为,“霍格特笔下的‘男孩’无家可归、焦虑紧张、穿着破烂,并且在很多方面都缺这少那。这种形象显然和‘奖学金女孩’不属于同一种类型”。后者在文学作品中有成功意识,成功、性感而且自信。

斯蒂德曼仔细关注了当代文化中尤其繁盛的自传模式。这种现象在吉登斯(Giddens 1991)关于“反思的自我”的观点中有所论述,并预示了了解自我的趋势的蔓延。然而,这并不仅仅只是作者沾沾自喜般的自我关注:

当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超出了其自身的范畴,成为一种认知形式,一种学术写作模式和一种存在于世的方式时,那么,就是对其进行调查的时候了,调查它在某个限定的环境里和某个时间点所生产的内容,并把这些大量的关于自传的内容呈送到某种历史审查的手中。(见本书第5章)

卡罗琳·斯蒂德曼个人的作家才能,或许在她的作品《好女人的风景:一个关于两个生命的故事》(*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1986)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她关注了文化研究的文学起源,以及文学研究何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研究这一问题。实际上,她的兴趣点在于:这一文学上的疑问和其自身的构建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即二战后的英国),和特定的体制背景(即“进步的”英语教学中)发生的。

马丁·李(Martyn Lee)在本书的一章中探讨了文化研究和人类地理学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近年来,由于文化研究很明显地受到来自对地理空间的关注的正面影响(如 Harvey 1989; Massey 1994; Soja 1989),李认为,地方和地域的特性存在着丧失的危险,尤其当主要的分析对象变得“全球化”之时,这种危险则更甚。在他看来,当今存在着一种诱惑,即简单地复制普及化、标准化、均质化的现代性的趋势,虽然那些趋势在理论上已经遭到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转向和“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 Seidman 1994)的破坏。

多林·马西(Doreen Massey)强调了特定地方的特性和能动性,这是一种对于“地方的进步”抱有希望的观点。受此观点以及多林·马西的

“权力几何学”(power-geometry)观点的影响,李提出概念性的术语,对城市的“特性”进行了经验式的分析。他借用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4)提出的“习性”(habitus)这一概念,并扩大了其适用性,以具体说明在城市里,物质环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人形成了行为习性。该论点很好地阐明了对于一个地方历史的认知,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形成问题。他参照位于英国中部并很典型地体现了经济和文化转型的考文垂这一“开放城市”,以一种虽然奇怪但很有特色的方式,具体地描述并分析了自己的观点。

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探讨了某种特定的民族志学研究的复杂性,认为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与其所研究的课题进行对话,以反观自我。她的兴趣在于舞蹈:舞动的身体及其象征意义,性别、性和“种族”如何与舞蹈产生意义关联。民族志学研究中的吉尔兹式的方法论(Geertzian approach),在这里被采用并被赞赏,因为它适用于阐释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意义,并能用来说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进行身份协商(negotiating identity)的困难性,比如,她着重评判了一些年轻的男性黑人舞蹈演员在舞蹈的性别含义方面的焦虑。由于西方的舞蹈文化是“女性化”的,所以他们担心自己在舞蹈含义中同性恋的身份被误解为是同性恋。

海伦·托马斯的研究聚焦在位于伦敦东南部的“拉班运动舞蹈中心”(Laban Centre of Movement and Dance)的一个年轻人的社区舞蹈团。她对那些舞蹈演员进行了个别访谈并展开小组讨论,而后,她对这些访谈录像进行了自我关照式的探讨。这种研究在提出研究课题、解决研究的焦点问题方面具有实用性。在本章中,她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说明了很多关于民族志学方法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安·格雷和格拉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本书中所写的章节里也有所讨论。有趣的是,托马斯所提出的敏感话题——“浅度描述”(thin description),是默多克在后面的一章中所探讨的主要话题。

文化研究,由于源于英国早期的研究工作,故在英国本土尤其兴盛。如今,一直有人呼吁,它应该对全球的问题有发言权,至少应该是跨国性的研究(Ang and Stratton 1996)。然而,这种呼吁只限于当地的、国家的